

张德禄 刘汝山 著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EXT
COHERENCE AND COHES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当代语言学丛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当代语言学丛书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EXT
COHERENCE AND COHES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张德禄 刘汝山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WILEY
外教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张德禄,刘汝山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81080-779-X

I. 语… II. ①张… ②刘… III. 语言学—理论研究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77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杨自伍

印 刷: 上海江扬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779-X / H · 280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当代语言学丛书》

编委名单

主 编：黄国文 秦秀白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初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朱永生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东英 （香港理工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杨永林 （清华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顾曰国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当代语言学丛书》总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组织策划了《现代语言学丛书》，并于 1985 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心理语言学》（桂诗春著）。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 14 部著作。此丛书的主编、编委和作者都是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现代语言学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为推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 年后的 1999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 12 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 and 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近两年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引进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39 本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6 本。这些著作在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考虑《当代语言学丛书》的组稿原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阅读和钻研引进的原版书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对于那些英语水平不太高的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来说，仍有必要用汉语为他们“引进”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引进，而是与国际学者对话，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相关的学术领域接轨。我们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因此我们希望《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作者在引进和评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能结合我国社会、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立足创新，勇于创新。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高等学校的语言、翻译、文化等领域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研习相关专业的广大读者。我们相信,汉语界的同人和读者也能从我们的这套丛书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某些东西。

我们希望更多的新一代学者能加入我们丛书作者的行列,共同为提高我国语言研究的水平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策划和组织这套丛书。我国语言研究者将永远铭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在普及和繁荣我国语言教学与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将与出版社一起为推动我国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当代语言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2月

序

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是语篇分析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各个学派的学者论述很多,但基本格调不外乎二:早期的学者,如 Halliday, Hasan, de Beaugrande 等认为语言衔接手段是保证语篇意义连贯的重要手段;稍后的学者认为衔接不一定表示连贯意义,而连贯不一定非得依赖衔接,从而试图以连贯理论来替代衔接理论。我认为前者属理论的草创阶段,有些问题不够全面是可以理解的,而后者在讨论中所举的例子许多不是来自真实语料,或者从一个本来是完整的语篇中抽出一两句“不衔接”的对话作为立论的根据,说服力不强。其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的是盖然率,它可以拿出绝大部分的语篇来说明衔接现象的存在和构成语篇的重要性,而后者以局部来否定总体还是说服力不强。最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来没有否定语境对构建语义的重要性。

国内有关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的讨论,多半转述国外的讨论。由于国外的连贯概念没有理论化,国内也就更无理论可言。所幸,张德禄和刘汝山的合著《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的发展及应用》试图表述国内部分学者的观点,构建使衔接和连贯得以统一的模式。从填补这方面的空缺这个出发点看,本书的选题首先应予肯定。

为进行本课题研究,两作者对衔接理论和连贯理论进行了定位,分别讨论其适用范围和特点。这个工作值得一做,不然,南辕北辙,没有共同语言。其次,两作者讨论了语篇连贯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就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这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确定衔接机制是语篇连贯的内部的必要的内部条件,便把脉络理清楚了。两作者在本书中还

讨论了衔接纽带、衔接力、语篇连贯和语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在语言交际中的衔接规则。这些都说明在我们讨论连贯理论时,完全没有必要抛弃衔接理论。换句话说,没有衔接理论的连贯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之所以讨论语篇的衔接理论与连贯理论一方面出于理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该理论的应用价值。在文体学、翻译学、外语教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无不运用了衔接与连贯的概念。两作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要理解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不妨读一下本书。要探索语篇衔接与语篇的更深层的关系,有待于读者和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步提高的。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3年4月

语篇和语境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序

张德禄和刘汝山两位教授写的这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论语篇连贯的总体条件”的主体部分。他们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国语》等刊物上,而后分别纳入全书的章节,经补充、修改与再加工而成书。应该说这是完成课题的一个好办法。

读完这本书稿,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1. 接好了前人的棒。科学研究就是接力跑,第一项基本功就是接好前人的棒。所谓接好前人的棒就是准确评价前人的成就和找准前人研究中的问题。接不好棒所做的研究就没有真正的起点,跑得再快也是无效劳动。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特别眼下学风不正,学术研究数量第一,这种气候使很多人不愿花这种工夫,不少学术著作中这一部分做得很少甚至没有。没找到起点,当然也就无从创造,结果厚厚的一本书,全是拼凑的。读起来一点新鲜感也没有,都是老生常谈。张刘这本书不是这样,在理论研究部分第一章就是“语篇连贯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他们不仅考察了 Jakobson (1960), Harweg (1968), Kintsch (1974), Coulthard (1977), Enkvist (1978) 等人对语篇连贯问题的研究,而且详细评述了 Halliday & Hasan (1976) 的语域和衔接的理论、Van Dijk (1977) 的宏观结构理论、Widdowson (1978, 1979) 的言外行为理论、Mann 等的修辞理论、Brown 与 Yule 的心理框架理论以及 Danes 与 Fries 的主位推进理论等,比较恰当地评论了前人的成就与问题,从而找到了自己研究的起点:“综合起来看,这些理论模式几乎涉及了与语篇连贯有关的所有方面,但一个共同的缺陷是它们都没有单独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具体

的、有较高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我们要力图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起点,后边的创造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研究的起点不是前人与时贤研究的缺陷或问题,而是他们的成绩或者是自己的成绩,那这种研究十之八九不会有什么创造,而只能是拼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这种接力跑,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最根本的理念和规矩,不这样做恐怕就不能叫学术研究。

2. 重视理论创新。我看过一些学术专著,收获很小,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材料的排列与简单分析,理论上没有创新,也不成系统。一本学术专著首先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不但要有新观点、新方法,而且理论上要有自圆其说的逻辑性。张刘这本专著具有这样的特点。该书的理论目标是为语篇连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具体与有较高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作者针对这个理论目标,首先对语篇连贯涉及到的基本范畴衔接、语域、连贯、情景语境、社会文化因素、心理认知因素和语篇等从内涵、外延、发展过程、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包含社会文化(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认知心理(认知模式和心理思维)、语篇意义与衔接机制等四个板块群的语篇连贯的理论模式。(见本书第一章1.5节)这个理论模式尽管还有不完善之处或其他不足,但它是创新的,也是有逻辑系统的。我想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只要读了全书大概都会得出这个结论。在学术研究中理论创新应大力提倡,因为,一是时代与社会进步的要求;二是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三是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至今还影响我们理论创新。这儿我只想就第三个方面发表一点个人拙见。吾淳(2002:111—112)在他的《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讲到中国科技确立基本范型后就具有实用、技术、经验、工匠与神秘等五种倾向。前四种倾向是与兴趣、科学、逻辑及学者相对立的,显然这是一种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王元化先生(2001:117)也说及这个问题:“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一个问题,根深蒂固,不可忽视。这种轻视理论研究的传统对我国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带来很大影响。陆俭明(2001:71)说:“现

在,在中国语言学界,一提起层次分析,想到的是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奈达(E. Nida)、威尔斯(R. S. Wells);一提起变换,想到的是海里斯(Z. Harris);一提起转换,想到的是乔姆斯基(N. Chomsky);一提起‘格’语法,想到的是菲尔墨(C. J. Fillmore);一提起配价,想到的是特斯尼耶尔(L. Tesnière),等等。其实,层次也好,变换也好,转换也好,‘格’也好,配价也好,在我国20—40年代的一些语法著作中都已有所论及,有些地方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理论意识,所以即使像吕叔湘先生那样的语言学大家,也未能将自己的这些新的想法升华为理论,加以深入论述,因而鲜为人知。”由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缺少形式逻辑的洗礼,所以在学术界不少人长于经验思维,短于逻辑思维。前者在方法上主要靠直觉、类比、归纳,而后者主要靠公理系统、推理、演绎。由于我们在方法论上的缺陷,结果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长期陷入一个误区,以为从某些材料归纳出几点看法,或从某些材料中悟出一些想法,这就是理论。实际上经验思维的结果只是逻辑思维的起点,而后经过推理、演绎才可能构造出有逻辑系统的理论。我们有很多研究成果缺乏理论系统,致使许多大家也没能成为有影响的流派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语言学界有没有学派,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理论上完整系统、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派。我曾想,像马建忠、章炳麟、王国维、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陈望道、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都是既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的大家,而且像赵元任和李方桂还曾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与副会长,可为什么没一个人创立出语言学流派呢?恐怕只能用中国有严重轻视理论研究的学术传统来解释。正像中国语言学史专家何九盈(2000:5)所说:“中国的语言学一直未能登上最高峰,与理论思维的缺乏有直接关系。中国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孔老夫子不算,因为他是古人),登上了最高峰。”这种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要改变很难,尽管现在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

题,在努力推动理论研究,想创立学派,但这个困难不可低估。这种学术范式的改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它需要有比较充分的材料的准备,需要有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系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准备,还需要比较成熟的研究群体有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与成果。何九盈(2000:6)也感叹:“就语言学科而言,过去没有像样的理论体系,现在也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思维的风气,中国人想在语言理论阵地上真正登上‘最高峰’,恐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践吧,理论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3. 重视应用研究。这本书除第二、第三部分某些章节讲到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之外,第四部分分四章专门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理论在文体学、翻译、外语教学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说到应用研究,我曾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不喜欢抽象的理论,所以要做应用研究。”还有“应用研究就是理论的应用,它本身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这两种说法在我国学术界相当普遍,在外语界尤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也说:“理论要以应用(实践)为基础,应用又以理论为指导。可以说语言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武器,而应用语言学则是鉴定各种理论的实验场。”(460—461页)真的应用研究就是现成理论的应用吗?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和许多人的学术研究证明不是这样。“从学习了语言学某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到会用于提高教学与科研的能力与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把这个距离叫学与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如不认真度过,教学科研上难以走出困境,所以这个中间地带很值得研究,应当从这儿生产出新的学科。”(杨自俭,2002:582)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主编了《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一书,强调了如何渡过这个中间地带,效果如何,由读者评判。张刘这本书在讲应用这部分大都不是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而是在探讨从理论到应用的过渡之后提出具体的应用方法的。比如关于此项研究在文体学中的应用,作者首先展示出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模式和文体学理论模式,而后将二者加以比较,找出其异同,比较细致而准确地说明二者的关系,为过渡到应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再比如在翻译中的应用一章,

作者首先研究了翻译的类型与“对等”、“翻译与连贯的关系”等过渡性理论问题,而后深入到原语与目的语的语篇研究,包括类型、机制、社会文化背景、情景语境、翻译的目的与用途等。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那种认为应用研究比理论研究简单、把学的理论拿出来套上就行的观点应该放弃了,不然应用研究无法发展到更高的层次。我最近读到于根元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其实1993年于先生就把上述问题讲清楚了。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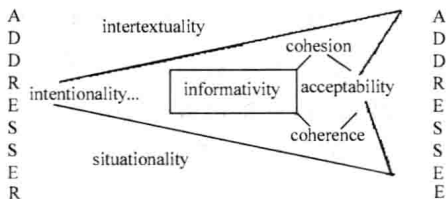
应用不等于简单地把现成的理论拿来用用。大理论就那么一些,为什么用起来就大不一样了?这当然有个对理论的掌握、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应用对理论有验证、调整、补充的作用。有时候是很大的调整。所以不能小看应用研究。拿语言学来说,有一种说法,好像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本身并没有理论。其实,就拿理论应用来说,语言学的许多学科有谁准备好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好让我们来用呢?我们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一面还要注意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完善或者建立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本身还有理论和方法。近来不是提出了个“应用理论”吗?

任何一种研究都有科学化与理论化问题,应用研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理论?翻译研究没有理论指导怎么能行?任何工程技术也都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理论与应用都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理论有不同的功能,不同层次的应用需要不同层次的理论。正如于根元所讲:

我觉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都有个层次问题,例如概括了第一层次应用的基本规律的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而掌握了第一层次基础理论的第二层次的应用则比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高,当然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我们搞基础理论总还是要用,探求知识,提高知识,改变观念也是一种用吧。(1999:8—9)

这个序我之所以用“语篇和语境”作标题,一是感到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研究尚需在这方面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化与理论化;二是感到这两个范畴与许多相关学科比如文体学、翻译学、美学、心理学、句法学、逻辑学、语用学、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研究它们有重要价值。

首先应研究什么是语篇。Halliday 和 Hasan 认为语篇是应用中的语言单位,不是句子一样的语法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部长篇巨著,是不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达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我国研究语篇的人也大多是这样解释。这里有 3 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语篇到底是什么?是语言单位?语法单位,还是语用单位,语义单位,交际单位,还是一个交际系统?它是语言单位没问题,要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交际系统。因为语篇要适应人交际的需要,比如要与人交谈,要演讲,要写论文,要创作小说等。是要完成一个较复杂的交际任务而做出的一个交际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文字形式的。第二个是这个交际系统在形式上有没有大小的标准?Halliday 等人的说法是大小不限。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可构成一个语篇,那么这个语篇的 cohesion 和 coherence 在哪儿?如何去研究?我想可以说,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完成一项简单交际任务的叫做一个交际单位,但还不是一个语篇,而语篇应是由两个以上的交际单位构成的一个较复杂的交际系统。第三个问题是语篇这样一个较复杂的交际系统在形式上与内容上是怎么构建的?需要哪些因素构成?Beaugrande & Dressler 在合著的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1981) 书中提出了语篇的 7 条标准,罗选民(2002:11—13)把它们整合成一个语篇(罗称话语)建构模式:



这个模式描写的是由传讯者到受讯者的交际过程。最先前部分是传讯者的意图性,体现意图性的是信息度,信息度要靠形式上的衔接和内容上的连贯来表达,影响与制约衔接与连贯的既有互文性又有语境性,最后可接受性达到受讯者,完成交际任务。这7条标准显然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的标准,不仅有语篇,还有生成和解读语篇的条件。语篇应是一个有声音或文字的实体,读听者可以据此解读(听)其意义,这样语篇就只能包括信息度、衔接、连贯三项,其他四项都是读听者解读(听)语篇时要找来帮助解读(听)的,如果算作语篇的标准,那也只能是隐性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衔接、连贯与信息度三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信息应有词、短语、句子、句组作为载体(或语音或文字)而表现出来,它们都有意义,这些语言形式和它们包含的意义如何连接成语篇,那就要靠衔接和连贯。那么,什么是衔接,什么是连贯,二者关系如何,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个范畴及其关系的研究尚需科学化与理论化。衔接的内容除 Halliday & Hasan 提出的 *reference, ellipsis, substitution, conjunction; reiteration, synonymy, hyponymy, collocation* 之外,还有哪些没有发现?衔接除包含语法衔接与词汇衔接之外应不应该再向语篇之外寻找类似衔接的因素,如果可以这样扩展,那结果会不会破坏它与连贯的关系?这些问题尚需我们进一步探讨。关于连贯的研究更复杂一些,王全智(2002:29)总结了七种解释:1. 连贯表现为语篇的主题;2. 连贯是形式、语义和语用上的相关性;3. 连贯由统一的修辞结构来体现;4. 连贯是语用上的相关性;5. 连贯是推理的结果;6. 连贯是参与、谈判、合作的结果;7. 连贯反映经验或常识。从上述的不同解释可以看出关于连贯的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还很很不统一,有的从作者出发,有的从读者出发,有的在语篇内寻找,有的从语篇外寻找,有的为了生成语篇,有的则为了解读语篇,有的从静态把语篇当作结果,有的从动态把语篇看成过程。这儿也有像扩大衔接一样的问题:连贯是不是应该只从作者、语篇内、生成与结果方面去研究,而不应从读者、语篇外、解读与过程方面去研究?如果扩大研究范围会不会破坏它与衔接的关系?同样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衔接与连贯的关

系能不能等同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也有人用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研究语篇,关联理论是一种信递和认知理论,把语言交际当作推理过程。用关联理论研究语篇就是从认知的角度寻找连贯,它特别强调人的推理能力。当然,这推理能力语篇作者可以有,可用以构建语篇;语篇读者也可以有,可用以解读语篇。二者运用推理能力都有个适度的问题,其度应控制在不破坏语篇的连贯为宜。

语篇的生成和解读都离不开语境(context),所以要深入研究语篇,就应研究语境。自从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来,国外有很多人研究语境,有较大影响的如J. R. Firth(1950), Halliday(1964), Hymes(1968), J. Lyons(1977), Brown & Yule(1983), W. V. Harris(1988), R. Scollon & S. Scollon(1995)等。国内最早研究语境的可能是陈望道(1932),60年代以后有陈宗明(1980)、张志公(1982)、王德春(1983)、王建华(1987)、王建平(1989)、周礼全(1994)、廖秋忠(1994)、王希杰(1996)等等。从以上研究语境的人来看,有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文化学家等,语言学家中又有社会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功能语言学家、语法学家、修辞学家、语义学家、语用学家等,Chomsky也关注语境问题,所以才提出了context-free和context-sensitive等的规则。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语境问题?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20世纪语言哲学家都在研究语言,一些哲学家称他们的哲学叫Philosophy of Language,表现为逻辑主义,他们主要研究语言的指称、意义、真假、必然、可能等问题;另一些哲学家称他们的哲学叫Linguistic Philosophy,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认为该哲学只有方法论意义,主要研究言语活动、语言的实际用法,避免误用语言,以保证知识的科学性。总之,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是意义问题和科学知识的合理表达形式问题。(车铭洲,1989:4)我们知道哲学思维的更新是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先导,哲学家讨论了近一个世纪的“意义”问题,会对许多与意义相关的学科产生导向作用,所以众多学科关注与意义关系密切的语境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哲学家A. P. Martinich(1996:7)

说得很深刻:“当哲学搞得出色时,它就有助于科学的诞生。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使生物学得以诞生,布伦坦诺和詹姆斯的工作使心理学得以诞生,弗雷格的工作使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得以诞生,蒯因和哥德曼的工作使转换语法得以诞生。类似地,语言哲学使认知科学得以诞生。”第二个原因恐怕是上个世纪中期,information theory 和 communication science 产生以后,语言的研究开始从静态的语言体系的研究逐步转向语言应用理论的研究,围绕着交际中的语义问题产生了许多学科,而交际中的语义研究最核心的范畴就是语境。

到底什么是语境?我想对比分析一下王建平(1989)和王建华(2002)两人对语境的界定与分类。

王建平的定义是:“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西楨光正,1992:62)他以语篇内外为界把语境分成言辞语境和言辞外语境,前者又分篇章、段落、句子、词组4种语境,除词组外,每一种又分所在单位语境和前后单位语境。后者分为主观语境因素(交际者的认识水平、思维修养、心理背景等)和客观语境因素(交际的时间、场合、对象、话题等)

王建华(2002:190)的定义为:“语境是语用交际系统中的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与具体的语用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语用过程相始终的、对语用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它是诸多因素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又同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互相渗透;它既是确定的,又是动态的,以语境场的方式在语用活动中发挥作用。”他在《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一文中首先确定了周遍性、层次性和简明性三个语境分类原则,而后把语境分为:(见下图)

两个定义相同的地方是都指出了语境的属性(交际过程中的要素)、研究对象(环境因素或条件背景)和功能(表达特定意义或影响语用活动)。但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前者表明语境包括交际者的主观语境因素,而后者强调了语境和语用主体与话语实体同在一个结构平面上,三者是并列关系,也就是说语境不包括交际者,当然也就不存在主观语境因素。但又说语境同语用主体与话语实体互相渗透,